

制度变迁、国际货币改革与中国的选择

陈伟光， 钟华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文章认为国家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国际货币制度不均衡的关键原因是国家的经济价值。作为公共产品,由集体行动所供给的国际货币制度由于搭便车和外部性产生滞后效应。在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国际货币体系中,由单个国家(中国)或自愿合作的国家集团(欧盟或亚洲货币区)所主导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一种有效的边际改革,将会带来由美元主导的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到多元的稳定的国家货币体系。由于中国的国家经济价值不断提升,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应该内外兼修,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联盟的“锚”货币。

关键词: 制度变迁; 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金融治理 “锚”货币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098(2015) 01 - 0003 - 06

自牙买加体系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是如此缓慢,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时有发生。特别是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就更加迫切。在无世界政府的情况下,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1]该系统本身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无论在当前的状态还是未来的演进秩序方面,如果没有充分了解它的历史,就不可能正确的理解它。^[2]4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分析,以期对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提供一种合理的选择路径。

一、国际货币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国际货币制度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一系列规则,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它不仅具备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性规则),而且还具有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减少不确定性)。它的本质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3]27 公共物品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和搭便车问题,是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重要根源之一,^[4]也是国际货币制度不均衡的重要原因之一。虞群娥认为国际货币制度不均衡的原因表现为主体行为错位和制度缺失。^[5]另一方面,舒尔茨说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简而言之,这些立法和法律是为适应由人的经济价值提高所致的制度的压力与限制而做出的滞后调整。^[6]在国际货币制度中,讨论的不是个人的经济价值而是以国家为个体的国家的经济价值。国家的经济价值的提高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牙买加体系,依次体现的是英国、美国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价值的不断变化。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价值的增强使得它们成为如今国际货币制度最迫切的需求者和改革者。历史证明,

收稿日期: 2014 - 12 - 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IRT1224)

作者简介: 陈伟光(1963 -),男,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经济治理; 钟华明(1990 -),男,广东湛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

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最强大时,其货币就是全球最主要的货币。主要大国的经济价值发生对比变化,是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

二、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史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主要指两种不同的国际货币制度的转替换和交接,是世界各国的经济价值发生相对变化的结果。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动因主要是制度均衡结果被打破,制度功能无法满足国际金融活动的需求,原来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性形同虚设,此时对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需求与日剧增。^{[3]28}一种国际货币制度之所以需要或可能开始某种程度的变化,往往源于该制度安排的利益已不足以补偿其成本,制度结构失衡使得各权力主体都试图从制度现有的总收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7]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推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行。^{[8]269}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的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的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5]104}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中,金本位制的形成是各个国家自发行动所导致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由美国所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现行的牙买加体系部分是由美国所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另一部分则是其他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潜在利润的诱导下自发所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一)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金本位制

早期的非正式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大量的重复交易实际上是一种重复博弈的过程,交易中的当事人出于对长远利益的关注会放弃一些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某些零星的个别惯例或习俗被自觉遵守。这种自发形成的货币安排具有内生性。^{[7]36}由国际协商建立货币安排只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态。更为通常的是,邻国先前的货币安排决策约束了本国的选择,从而自发地引发了相似的货币安排。更一般地说,货币安排是内生于历史之中的。^{[2]5}

金本位制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商品货币中演化出来的。在 1821 年,英国废除了白银的法币地位,正式转向金本位制,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大多实行的还是金银复本位制或银本位制。19 世纪 50 年代的黄金大发现使得黄金的产量翻了十番,大大增加了黄金的供给,为在工业革命后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的各个欧洲强国实行金本位制提供了条件。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得到了法国大量的战争赔款,用这笔钱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并且成为欧洲当时的第二大强国。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一方面,铸币厂将蒸汽动力应用到造币技术中,使得金币的铸造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使得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开始了对其他国家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与英国和德国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在 19 世纪 80 年代都迅速地转向了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形成是一个社会选择的过程,该制度稳定的基础是政府赋予了维持可兑换性的优先权,即其它政策目标从属于货币稳定,使得汇率得以在黄金输送点之间波动。

在 1931 年,英镑的贬值标志着金本位时代的结束。金本位制的崩溃一方面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的秩序,另一方面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商业和金融中心,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心从战前的英国转移到战后的美国。美国成了全球金融市场冲击的主导来源,美国经济增长提高了危机成为普遍现象的风险。虽然美国在 19 世纪末仍然是农业国家,但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2]38}1913 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比其他三个经济体(英、法、德)总和还大。1923 年,美国几乎拥有了世界黄金总量的一半之多。^{[9]2-3}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总而言之,美国和国家经济价值的相对变化使国际货币制度发生了变迁。

(二)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集体行动的主导力量。“霸权主导”是这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10]布雷顿森林会议批准的国际货币体系始于 1934 年,当时美国终止了其浮动汇率政策,将黄金官价从每盎司 20.67 美元提高到每盎司 35 美元。当布雷顿森林会议举行的时候,美元

已经是全球的记账单位和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11]98-99}在1943年4月7日美国和英国分别发表了“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但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方案,其中主要内容是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实行双挂钩原则,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并按35美元每盎司的汇价兑换黄金。建立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是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12]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制一样都曾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但它却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由霸权国家(美国)所强制实施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居于国际经济的支配地位,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批准了(该会议并没有创造什么新体系)当时已存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准货币。^{[11]12}这次会议只是给美元霸权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在无世界政府的情况下,霸权主义解决了由集体行动提供公共产品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美元霸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与贸易环境。这就是奥尔森所说的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特权集团或选择性的激励。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即特里芬难题:国家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其稳定性。只有当美元可以毫无疑问地兑换为黄金时,积累美元储备才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一旦外国美元余额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人们就会对这一承诺的可信性产生怀疑。^{[2]114}蒙代尔也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不对称的体系,好处是考虑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缺点是没有一个机制确保美元能够长期与黄金兑换。^{[11]131}如法国总统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威胁美国要变现他的美元资产,使得美元面临严重危机。在1971年,尼克松政府停止兑换黄金,并和西方各国在1971年12月达成“史密森协议”,让美元对黄金贬值,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但由于美国的持续逆差,在1973年史密森协议崩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简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美国对外的政策目标维持汇率稳定已经让位于对内的政策目标保持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国家经济价值下降,西欧和日本的国家经济价值上升,国家经济价值的相对变化要求国际货币制度相对的调整,以反映国家的经济利益。

(三) 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牙买加体系

1. 牙买加体系的诞生

牙买加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13]它是对20世纪70年代崩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合法化,其主要的制度安排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化国际储备和浮动汇率体系。1976年,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并签订了“牙买加协定”,并且在同年4月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修正案》,规定在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牙买加协定》的主要内容:黄金非货币化,浮动汇率合法化,重新修订IMF的基本份额,提高SDRs的国际储备地位。总而言之,“牙买加协定”并没有创建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它只是对当时制度环境的合法化,美国仍然是该制度下的主要供给者。美国在1971年单方面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其他的几个大国只好跟着宣布它们的货币与美元脱钩。美国使得国际货币制度强制性变迁的结果是形成了现今仍然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最大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2. 欧元的诞生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8]263}为了解决由美元所造成的特里芬难题,需要其他形式的国际流动性替代美元,即迫切需要创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诞生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对在美元信用本位制下国家集团追逐潜在利润的反应。西欧六国在1957年缔结了《罗马条约》组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79年实施了欧洲货币体系,创建了“欧洲货币单位”(ECU),它是欧洲货币体系的核心。在1991年12月,欧共体各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确定了具体的时间和步骤。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标志着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制度的一件重大的变迁事件。2002年7月1日,欧元区各国的货币退出流通领域,欧元成为欧元区内唯一的货币。欧元的诞生是对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补充,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呈现多元化的

局面。这是在没有霸权国家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前提下,由个体或个体组合(区域货币合作)在潜在利润的诱导下进行制度变迁的结果。

3. 现在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

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不断冲击着国际货币制度,使得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不仅出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有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方式的多样性。国际资本流动不可避免的增加,使得货币盯住更加脆弱,周期性调整更加困难。^{[2][18]}这促使可调整的盯住汇率向自由浮动和强化盯住两方面转化,主要的国际货币制度供给者如美、欧、日等实行了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行了盯住策略,如香港的货币局制度,从而形成了如今的中心-外围结构。但中心国与外围国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是当前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

牙买加体系并没有任何一种法定可行的国际收支调节方式,这一点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别无二致。而且对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应该采取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无任何规则,甚至缺少基本的惯例。^{[14][22]}国际收支调节多元化是对汇率制度多元化的反应,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本国的调节方式,无论是利率机制、汇率机制或动用国际储备货币等。毫无预期性的国际收支调节方式使得顺差国长期顺差,逆差国长期逆差,国际收支平衡从此成为政府大声疾呼的一句口号。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1]简而言之,在牙买加体系下,过去政策协调不足,未来政策缺乏协调,以及成员国自身面临的投机压力。^{[2][17]}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中。

三、未来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

针对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系统性缺陷,特别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专家学者提出了两种主要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分别是超主权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和三元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

(一) 超主权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

世界经济需要世界货币。由全球性的中央银行发行国际储备货币的政策建议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凯恩斯在他的著作《货币论》中已经提出。在代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时得到了完善,凯恩斯提出要建立一种以多种商品为定价基础的世界货币“Bancor”,但却被美国拒绝。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斯蒂格利茨在给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要建立一个全球的储备体系,以SDRs为基础,由IMF唯一发行,并且可以考虑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储备体系。在2009年,周小川提出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1]他还提到要充分考虑到SDRs的作用,因为SDRs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周小川的提议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也都被美国否定。

SDRs是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但在现实中是否可行?答案是否定的。作为在1969年由IMF以一篮子货币作为基准创立的SDRs直到今天只有4次分配,分别是在1970年发行的93亿的SDRs,1979年的121亿的SDRs,2009年的1827亿的SDRs(8月、9月各有一次),占全球外汇储备、贸易和GDP的比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SDRs的使用范围极其有限,远远不能和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所发挥的作用相提并论。这主要是由于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为美国带来巨大的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和优越的融资环境,而美国在IMF拥有一票否决权,在危机没有危及自身的情况下,不会有动力去推动SDRs的改革。纵观世界历史,世界大国都拒绝创建世界货币。^{[9][5]}一个稳定的世界通货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但在经济全球化远远超过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个体理性会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创建超主权货币是一个理想的构思,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可能实现。

(二) 三元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

国际货币多元化是当前国际货币制度安排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有利于减少国际货币制度的系统性风险,大大约束“领导者”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对于货币联盟,最优货币区理论(OCA)提供了理论指导,欧元的成功建立又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在没有一个真正统一的国际本

位币和支柱货币的情况下,货币区域化是理论和现实的选择。

蒙代尔指出如果欧元与美元能够合并成为一种货币,它将会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货币”以及世界货币,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固的核心。首先,需要固定欧元与美元的汇率,可以先允许汇率在较大的范围内波动。然后,需要相互协调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相互协调。此外,需要建立一套欧元区与美元区价格指数的体系,以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最后,如果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将与美元-欧元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货币区(Dollar-Euro-Yuan Area)。这个货币区需要共同的货币政策以维持其稳定性,同时DEY货币区将占据世界50%以上的出口量。^[9]张宇燕指出从2010年到2030年,人类将有可能看到一个“三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由美元、欧元和亚元或某个亚洲经济体之货币为三大支柱构建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真正构建“三元”国际货币体系,关键在于亚洲国家在推出本地区关键货币问题上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便主要取决于中国的选择。^[15]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主权货币的特里芬难题,而且有利于克服滥币陷阱、汇率波动及储备体系不稳定等问题。^[16]

三元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否可以建立起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的货币合作,这又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经济实力的强大必然会改变国际货币制度的安排。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货物进出口为4.16万亿美元;2014年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高居全球首位。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要求在国际货币制度中谋求相应的地位。但要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合作的“锚”,还为时尚早。国际货币关系向来都是经济政治实力的体现。亚洲地区并不像欧盟那样容易实现政治上的整合,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内外兼修,侧重内在,联合外在。侧重内在是指中国应该深化本国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完善债券市场,使利率形成机制趋向市场化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更加灵活,逐步开放资本项目。联合外在是指中国应该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支付、结算和储备货币,充分利用“东盟10+X”合作平台。

四、结论

在无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制度不均衡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变化,^[17]国家经济价值的相对变化产生了对国际货币制度新的需求。现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制的牙买加体系,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在没有类似于美元霸权的特权集团作为制度的供给者的情况下,为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由单个国家(中国)或自愿合作的国家集团(欧盟或未来的亚洲货币区)所主导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来进行有效的边际改革,让现行的货币制度过渡到两两固定汇率的三元的国际货币制度。亚洲地区是否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货币联盟是未来国际货币制度稳定的关键,由于中国的国家经济价值的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将直接影响着亚洲货币联盟的形成。亚洲货币联盟需要中国内外兼修,逐步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联盟的“锚”货币。

参考文献:

- [1]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9(7):8.
- [2]巴里·艾肯格林著.彭兴韵译.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3]宋文兵.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上)——一种历史制度分析的新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1999(11).
- [4]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4.
- [5]虞群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J].金融研究,2002(5):101-102.
- [6]西奥多·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罗纳德·H.科斯.刘守英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75-182.
- [7]殷德生.权力、相互依赖与国际货币合作——基于国际货币体系史的考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8):39.
- [8]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罗纳德·H.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

- 度变迁[M].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269.
- [9] 罗伯特·蒙代尔. 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基于创立世界货币的设想[J]. 厦门大学学报 2012(1).
- [10] 李晓, 冯永琦.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2): 112.
- [11] 罗伯特·蒙代尔. 蒙代尔经济学文集——汇率与最优货币区[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 [12] 庄起善. 世界经济新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24.
- [13] 洪波, 虞红丹.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牙买加体系的特点与问题[J]. 南方金融 2012(4).
- [14] 宋文兵.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下)——一种历史制度分析的新视角[J]. 国际金融研究 1999(12): 22.
- [15] 张宇燕. 人民币国际化: 赞同还是反对[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1): 39-40.
- [16] 李平, 宫旭红.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谁主沉浮[J]. 国际经济评论 2013(5): 19.
- [17] 陈伟光. 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 若干问题的思考[J]. 教学与研究 2014(2): 9.

A Study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and China's Choice

CHEN Weiguang ZHONG Huam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is a new demand for system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value and the key reason for the imbal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s the national economic value. As public goods due to hitchhike and externaliti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pplied by collective action has a lagging effect. The system is in the predica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dominated by a single country (China) or cooperative group of countries (EU or Asian currency area) is an effective marginal reform, it will make the unstable dollar-dominat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change to the stable multi-currency dominated system. Since the national economic value is ris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o China should make the RMB become the “anchor” currency of Asia Monetary Union.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nchor” currency

(责任编辑: 张秋虹)